

汉译圣经书名的演变

The Development of Tit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周复初 徐淑瑛 王世平

Zhou Fu-chu Shyu Shu-ing Wang Shih-ping

摘要：

圣经之书名的订定是要帮助读者了解圣经全书的主旨与内容，事实上也传达了译者的诠释。汉译圣经的书名因政治和文化因素而演变。例如，英译圣经书名是一贯地以“*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圣书：旧遗诏和新遗诏》）来命名。而汉译圣经的书名中，有些与英译圣经相对应，如《古新圣经》《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等。但也因政治和文化因素演变出《新旧遗诏圣经》或《新旧约圣经》或《新旧约全书》等具中国特色的圣经书名。

关键词：

汉译圣经；书名；演变；政治和文化；中国特色

Abstract:

One major function of a book title is to communicate the main theme and contents of the whole book; in addition, how the book title is translated conveys the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tit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While the English Bible book title has long been largely named as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of the book title have undergone changes throughout. The older versions *Gu Xin Shengjing* (《古新圣经》) and *Shen Tian Shengshu: Zai Jiu Yizhao Shu Jian Xin Yizhao Shu* (《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 though followed the English Bible title tradition, the scripture titles have been largely adopted as *Xin Jiu Yizhao Shengjing* (《新旧遗诏圣经》) or *Xin Jiu Yue Shengjing* (《新旧约圣经》) or *Xin Jiu Yue Quanshu* (《新旧约全书》). It is thu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se titles and their changes can be ascribed to unique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Key words: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book title; developm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inese features

1. 引言

近年来，《圣经》汉译的研究视角更多元，例如，任东升（2007）以文化视角探讨了圣经的汉译；周复初、谢仁寿和杭极敏（2019）显示，《圣经》汉译的研究已涵盖标点符号、字义、语法、介词词组、神学诠释、文化协调、隐喻、修辞等等多个层次。高玉霞（2015）初步梳理了汉译圣经之书名的发展。然而汉译圣经的书名如何因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而演变仍待深入探讨。Porter（2016）针对历时之各英译圣经，例如，伊拉斯谟《新约》（*Erasmus's first edi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1516）、丁道尔《新约》（*Tyndale's New Testament*, 1526）、《科弗代尔圣经》（*Coverdale's Bible*, 1535）、《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 1611）等等许多译本，探讨了书名的目的（purpose）、范畴（scope）和描述性（descriptiveness）。

2. 英译圣经的书名

本文先列出英译圣经的书名于表1作为对照组，¹以探讨汉译圣经书名的演变。表1显示，天主教英文《圣经》《杜埃—海姆斯版》（*Douay-Reims Bible*, DRB, 1609）和《英文钦定本》的封面的信息至少包括（1）书名：《圣书》或《圣经》（*The Holy Bible*）。²（2）内容主旨：《杜埃—海姆斯版》很明确地陈述目的：卷与章的论证；批注、图表和其他有助于认识文本的东西；一些近期译本之讹误的发现；且旨在澄清宗教上的争议，如 Daniell（2003: 359）所言，目的独尊拉丁文本 *Vulgate* 为正统，排除他版。《英文钦定本》包含旧遗诏与新遗诏。（3）来源与翻译过程：《杜埃—海姆斯版》显示是忠实地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参考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其他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钦定本》显示是由原文翻译而成，并且参考了之前译本，根据国王的指令修订而成，Daniell（2003: 427-450）指出，这含示了政治意图。（4）译者：《杜埃—海姆斯版》是由在杜埃的英国学院所译。（5）出版单位：《杜埃—海姆斯版》由 Laurence Kellam 在杜埃出版。《英文钦定本》由 Robert Baker 在伦敦出版。（6）出版年：《杜埃—海姆斯版》是公元 1609 年出版，《英文钦定本》是公元 1611 年出版。

表 1 英译圣经的书名页一览表

DRB(1609)	<i>The Holy Bible</i> , Faith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out of the authentic Latin. Diligently conferred with the Hebrew, Greeke, and other Editions in diuers language. With Augvments of the books, and Chapters: Annotations. Tables: and other helps, for better vnterstanding of the text.: for the discouerie of corrvtions for some late translations: and for clearing controversies in Religion. BY THE ENGLISH COLLEGE OF DOWAY. Printed at Doway by LAVRENCE KELLAM at the signe of the holie lambe. M. DC. IX ³ .
KJV(1611)	<i>The Holy Bible</i> , Conteyni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Newly Translated out of the Originall tongues: & with the former Translations diligently compared and reuised by his Maiesties special Commandment. IMPRINTED at London by Robert Baker, Printer 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iestie. ANNO DOX. 1611
ERV(1885)	<i>The Holy Bible</i> ,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ranslated out of the original tongues: being the version set forth A. D. 1611 compar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authorities and revised. 1885
ASV(1901)	<i>The Holy Bible</i> ,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ranslated out of the Original tongues: being the version set forth A. D. 1611 compar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authorities and revised A. D. 1881-1885, newly edited by the American Revision Committee A.D. 1901. Standard Edition
RSV(1952)	<i>The Holy Bible</i> ,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tongues being the version set forth A. D. 1611 revised A.D. 1881-1885 and A. D. 1901 compar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authorities and revised A.D. 1952.
NRSV(1989)	<i>Holy Bible</i> ,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ASB(1995)	<i>Holy Bible</i> ,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表 1 显示,《英国修订版》(*English Revised Version*, ERV, 1881)、《美国标准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1900)、《修订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1952) 这 3 个英译版本的 (1) 书名: 都是《圣书》或《圣经》(*The Holy Bible*) , 但《新修订标准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RSV, 1989)更简化为 *Holy Bible*。(2) 内容主旨: 都包含旧约与新约。 (3) 来源与翻译过程:《英国修订版》《美国标准本》和《修订标准版》皆显示是由原文翻译而成。并且《英国修订版》显示是根据 1611 年《英文钦定本》修订而成; 《美国标准本》显示是根据 1611 年《英文钦定本》, 在 1881—1885 年修订, 再由“美国修订委员会”于 1901 年编辑而成; 而《修订标准版》重复了《美国标准本》的叙述, 再加上于 1952 年修订而成。《新修订标准版》则不再叙述这些修订过程。较现代的英译圣经如《新修订标准版》和《新美国标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1995)的封面皆采简明的设计: *Holy Bible* 加上版本名。而将译者、出版单位和出版年等信

息移至他页披露。Porter (2016) 指出，当代版本对于内容、翻译方法和过程的叙述性较少 (less descriptive)，然而较详尽的书名标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主旨及内容。

3. 汉译圣经的书名

许牧世 (1983)、赵维本 (1993)、海恩波 (Broomhall, 2000) 和尤思德 (2002) 回顾了汉译圣经的发展，蔡锦图 (2018) 详细地记述中文圣经的历史目录。高玉霞 (2015) 特别梳理了汉译圣经之书名的发展。为了探讨其演变，本文将正式出版之汉译圣经的封面、书名页或版权页的信息列表于下。下页表 2 仅仅列出本文能找得到封面、书名页或版权页照片者⁴，并且许多地方官话和方言译本，如《南京官话译本》《北京官话译本》等等也未列入。表 2 并非一个完全、没有遗漏的列表，但已显示汉译圣经书名的演变与特色。

早期汉译圣经书名页所载的信息较多，但信息量仍比《杜埃—海姆斯版》和《英文钦定本》少了许多，其中包括 (1) 书名：例如，《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新约全书》《神天圣书》等等。 (2) 内容主旨：《神天圣书》包含旧遗诏书与新遗诏书；马殊曼译之《新约全书》包含新约，且文体是“文理”。 (3) 来源与翻译过程：例如，《神天圣书》显示是“俱从本文译述”。 (4) 译者：例如，《高德译本》标示“高德译订”。 (5) 出版单位：例如，《委办译本》是由“香港英华书院”印刷。 (6) 出版年：例如，《委办译本》《新约全书》是咸丰壬子年出版。

汉译圣经书名从初期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新旧约全书》和《神天圣书》等，一直演变到《思高译本》《吕振中》《现代中文译本》《恢复本》和《新译本》才相对一致地以《圣经》为书名，这种现象与表 1 之英译圣经书名的一致性截然不同。本文将探讨汉译圣经书名在 (1) 从《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或《新遗诏圣书》或《新旧约全书》等等演变为以《圣经》为主。 (2) 从以“遗诏”为主演变为以“约”为主。 (3) 从以“旧新”为主演变为以“新旧”为主等 3 种演变的原因。

表 2 汉译圣经封面、书名页或版权页比较一览表

译者或译本名称	书名页或版权页
马礼逊 (1813)	《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俱依本言译出
马殊曼 (1816)	《新约全书》新约（文理）马殊曼译本
马殊曼 (1822) ⁵	《旧约全书》旧约（文理）马殊曼译本
马礼逊 (1823)	《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俱从本文译述
郭实腊 (1839)	《旧遗诏圣书》由希伯来音翻译汉字

郭实腊（1840）	封面：《新遗诏圣书》，书名页：《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依本文译述
委办译本（1852）	《新约全书》咸丰壬子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
太平天国（1853）	《旧遗诏圣书》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
太平天国（1853）	《新遗诏圣书》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
高德译本（1853）	《圣经新遗诏全书》耶稣一千八百五十三年，高德译订 宁波真神堂敬送
委办译本（1855）	《旧约全书》咸丰伍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
委办译本（1855）	《新约全书》咸丰伍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
麦都思、施敦力（1857）	《新约全书》耶稣降世一千捌伯伍拾七年，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
裨治文、克陞存（1863）	《新约圣书》耶稣降世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苏松上海美华书局藏版
固利尔乙译（1864）	《新遗诏圣经》吾主伊伊稣斯合利尔斯托斯，谨遵原文译汉 敬镌版
杨格非（1885）	《新约全书》公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 英牧师杨格非重译
施约瑟（1902）	《旧新约圣经》耶稣降世一千九百零二年，美国施约瑟译，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印行
施约瑟（1905）	《新旧约圣经》（封面）
委办译本（1908）	《旧新约圣书》文理，上海圣书公会印发
施约瑟（1909）	《旧新约圣经》救主耶稣降世一千九百零九年，官话串珠， 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上海大美国圣经会
委办译本（1910）	《旧新约圣经》救主耶稣降世一千九百十年，文理，大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上海大美国圣经会
和合本（1919）	《新旧约全书》文理和合，上海大英圣书公会 《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上海大美国圣经会
王宣忱(王元德)（1933）	《新约全书》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朱宝惠（1936）	《重译新约全书》
思高译本（1968）	《圣经》
吕振中（1970）	封面：《圣经》 ⁶
现代中文译本（1979）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⁷
新译本（1992）	《圣经》新译本
恢复本（2003）	《圣经》恢复本
和合本修订版（2010）	《圣经》和合本修订版

4. 从《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或《新旧遗诏全书》或《新旧约全书》演变为以《圣经》为主

4.1 书名的演变

阳玛诺 (Manuel Dias, Jr., 1574—1659) 于 1636 年完成四福音书的汉译，以《天主降生圣经直解》为书名。再者，贺清泰 (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53—1814) 在离世前完成了翻译旧约和新约内容 36 卷，题为“古新圣经”，未正式刊行。蔡锦图 (2018: 47) 以“圣经”作为书名似乎早有依凭，但马礼逊于 1813 年出版《耶稣基督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又于 1823 年出版《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马殊曼于 1816 年出版《新约全书》，又于 1822 年出版《旧约全书》，马殊曼和拉撒于 1822 年出版《新旧遗诏全书》。自此直到 1919 年《官话和合译本》以《新旧约全书》为书名，以传教士为主译者的汉译圣经是以“圣书”或“遗诏书”或“新约全书”或“旧约全书”为主要的书名。较特别的有高德译本 (1868) 《圣经新旧遗诏全书》、东正教于 1864 年出版的《新遗诏圣经》、施约瑟 (1902) 《旧新约圣经》和施约瑟 (1906) 《旧新约圣经》，将“圣经”与前述主要书名结合。

以中国人为主译者的圣经，如王宣忱 (王元德) (1933)《新约全书》和朱宝惠 (1936)《重译新约全书》，仍以《新约全书》为书名。周作人 (1921) 仍称汉译圣经为“圣书”。但是，自 1968 年《思高译本》开始，《吕振中译本》(1970)、《现代中文译本》(1979)、《新译本》(1992)、《圣经恢复本》(2003)、《和合本修订版》(2010) 皆以简明的《圣经》为封面书名，这演变是译者根据当代社会大众之认知与趋势而做的调整。

4.2 “圣经”所指涉的演变

陈熙远 (2016) 指出，传统知识阶层在言谈笔论中提及的“圣经”一词，率多指涉儒教经典，从先秦的“六经”（《庄子·天运》）到滥觞于南宋的“十三经”，殆皆属于儒教的“圣经”。⁸

南宋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宋德隆盛，治教休明……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 (朱熹 2012: 5)。唐代韩愈《答殷侍御书》：“圣经贤传，屏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寻” (韩愈 1966: 18-6)。事实上，“圣经贤传”渐渐成为一个成语。

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回：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第二十七回：三藏闻言道：“女菩萨，你语言差了。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吴承恩 1983: 330)。

这两处所提到的“圣经”分别是指《周易系辞上》和《论语·里仁》。

《西游记》第一百回：又叫那白马，“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马”（吴承恩 1983: 1242）。这里所提到的“圣经”却是指佛经。

康有为（1858—1927）在 1891 年初刻《新学伪经考》中主张，“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瘞，沦于雾雾……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也”（1891: 2）梁启超（1873—1929）于 1898 年也曾在《戊戌政变记》说：“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1898: 3）。康有为和梁启超所称的“圣经”，皆是指儒教经典。

然而，“新文学运动”又称“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和《官话和合译本》的刊行带进一些转变，周作人（1921: 14）就指出：

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譬如现在的新诗及短篇小说，都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倘照中国文学的自然发达的程序，还不知要到何时纔能有呢。

周作人论到新文学又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1921: 18）

袁进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2007: 123-128）。张中良不只认同袁进的观点，也指出，“虽然官话土白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2010: 37）。这些研究分析显示，西方传教士所翻译的《圣经》、书写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有很大影响。

从另一角度来看，自“新文学运动”之后，大量文人和作家以“圣经”指涉基督徒的《圣经》。例如，冰心（1900—1999）说道：

圣经这一部书……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幅图画；因为它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

冰心在她的作品中至少 17 次提及“圣”，指基督徒的《圣经》。

张爱玲（1920—1995）在《封锁》说道：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

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再如，鲁迅（1881—1936）在《坟》；朱自清（1898—1948）在《佛罗伦司》《莱茵河》《巴黎》《三家书店》《博物院》和《加尔东尼市场》；林语堂（1895—1976）在《人生的盛宴》；沈从文（1902—1988）在《阿丽思中国游记》和《大山里的人生》；老舍（1899—1966）在《二马》和《正红旗下》；郁达夫（1896—1945）在《移家琐记》《南迁》和《迷羊》；钱锺书（1910—1998）在《围城》和《上帝的梦》；白先勇（1937—）在《小阳春》和《香港——一九六〇》等书中的“圣经”皆是指基督徒的《圣经》。

另以“语料库”搜寻“圣经”的结果显示，“中央研究院”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和“中央研究院”中古汉语标记语料库皆显示0笔数据。“中央研究院”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显示1笔数据，是前述《西游记》第一百回者，指“佛经”。“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标记语料库则有65笔资料，其中64笔指基督徒的《圣经》。语料库的数据显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圣经”的指涉上差别很大，现代汉语语料库才有大量的“圣经”指涉基督徒的《圣经》。

前述的梳理显示，“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和《官话和合译本》的刊行带进一些转变，在此之前，对于文人和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圣经”二字代表的主要还是儒教经典；在此之后，大量的现代文学与散文作家以“圣经”指涉基督徒的经典。到了20世纪后半叶，文人和一般社会大众认知的《圣经》主要是基督徒的经典。

5. 以“遗诏”为主演变为以“约”为主

5.1 以“遗诏”或“约”为书名的演变

表2显示，马礼逊于1823年出版《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显然是将“神天圣书”对应于“The Holy Bible”将“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译为“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马殊曼和拉撒于1822年又以《新旧遗诏全书》为书名。郭实腊于1839年出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和《旧遗诏圣书》；太平天国于1853年出版《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高德于1853年出版《圣经新遗诏全书》。至此，以“遗诏书”作为书名是延续英译圣经的“Testament”的传统。

但是，委办译本（1854）以《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为书名是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麦都思和施敦力（1857）《新约全书》、裨治文和克陞存（1863）《新约圣书》、杨格非（1885）《新约全书》、施约瑟（1902）《旧新约圣经》、委办

译本（1908）《旧新约圣书》、施约瑟（1909）《旧新约圣经》、和合本（1919）《新旧约全书》、王宣忱（1933）《新约全书》和朱宝惠（1936）《重译新约全书》皆以“约”标明圣经的内容。这又形成以“约”为主的趋势。高玉霞（2015）也提及此现象，但没有深究其原因。

5.2 政治上的考虑

陈熙远（2016：31-34）指出，在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之乱，洪秀全在其控制范围内发行《旧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书》《钦定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钦定新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太平天国时，圣经题名使用“遗诏圣书”是因为洪秀全尊神为天父，基督是天兄，认为圣经为天父与天兄的遗命。然而同时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1854）中却称其为“新约”：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 2005：1-3）

陈熙远（2016：34）认为，曾国藩有可能出自在政治避讳上的考虑，（即“遗诏”一词恐有抵牾皇权之虞），故不用“遗诏圣书”，而用“新约”。

5.3 委办译本《新约全书》的大量印行

赵晓阳（2010：75-82）指出，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的消息让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之轰动，为了应对即将来到的众多中国人圣经读本的需求，1853年9月，英国圣经会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Million Testaments for China）运动。英国平民信徒的热情和捐款超乎想象地热烈，使委办译本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到1869年，已经刊印了75万册委办译本。海恩波（2000：96）也指出，“一百万本圣经分发计划”到1869年，共印行了《委办译本》10万本圣经，75万本新约，《官话译本》10万本。这75万本《新约全书》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量，之后的圣经书名，“约”渐渐取代了“遗诏书”。

另外，冰心在《作品第二卷》和《作品第七卷》，朱自清在《博物院》，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巴金在《雾雨电之电》，鲁迅在《坟》《朝花夕拾》和《而已集》，郁达夫在《沉沦》，钱锺书在《围城》和《写在人生边上》，老舍在《正红旗下》等书中论及基督徒经典时，皆提及《新约》或《旧约》或《新旧约全书》，不再使用“遗诏书”。这现象显示圣经书名从“遗诏书”到“约”的演变。

6. 汉译圣经合订本之取名以“旧新”为主演变以“新旧”为主

如表1所示,英译圣经合订本的传统是“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旧”在前,“新”在后。而早期汉译圣经合订本,如《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明显是参照《钦定本》的书名页而译的。而这“旧新”的传统一直有版本采用,例如施约瑟(1902)《旧新约圣经》、委办译本(1908)《旧新约圣书》和施约瑟(1906)《旧新约圣经》。吕振中(1970)在边栏仍使用“旧新约全书”。

但是,施约瑟(1905)《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全书》文理和合译本(1919)和《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1919)等显示了以“新旧约”为主的发展趋势。到了20世纪下半叶,《思高译本》(1968)于《序》中说:“中文新旧约合订本,几经艰辛,终于出版面世了”。《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79)《序言》中说:“联合圣经公会……一九七九年完成新旧约圣经。”《恢复本》(2003)也在《介言》论及“新旧约圣经”。许宏度(2013)以《新旧约圣经轻松读》为书名。

高玉霞(2015: 284-295)探究了这从“旧新”为主演变以“新旧”为主之现象,她认为的原因:第一,翻译先后。根据圣经汉译史,可以看出传教士大多先译《新约》,后译《旧约》。第二,传教策略。基督教更加看重《新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教义主要是《新约》。第三,话语习惯。汉语习惯“新”在前“旧”在后,即“新旧”。本文认为,在上述3个原因之外,至少还有3个原因。

6.1 语言学上语音因素影响词序先后顺序

根据Cooper和Ross(1975)的观察,双字词中(例如, [X₁] + [X₂]),首字词(X₁)开头的辅音响度(sonorant)大于第二字词(X₂)的辅音响度,例如“huff and puff”(h > p)。Zec(1994: 63-64)依照英文元音、辅音的响度大小排序如下: Vowels > h > Glides (w, y) > Liquids (l, r) > Nasals (m, n, ɳ) > Spirants (f, v, s, z, θ, ð, ʃ, ʒ) > Stops (p, b, t, d, k, g)。如此一来,英文的词序“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o/ > /n/: 元音大于鼻音),翻译成中文时的顺序“新旧约”(xin-jiu → ㄒ > ㄐ → /ɛ/ > /tɕe/: 擦音大于塞擦音),就都合于这个“响度”原则。

6.2 有些文人对天主教与耶稣教的评比

王韬系《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研修了《新约》与《旧约》的所有教义(游斌2007)。但王韬于1875年《瀛壌杂志》对耶稣新教和天主旧教有些评比时说:

旧教盛事科仪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尚清修,而无一切拘挛陋习,尚近于儒。有新、旧约两书,为彼教中圭臬。(王韬1875: 11)

王韬称耶稣教为“新教”，且主张耶稣新教“尚近于儒”，显示了他对新教的偏好，且以“新、旧约两书”指圣经：

司香旧尉〔邹弢〕于 1896 年藉小说主角，说出对天主教与耶稣教的评比：

不同的很多呢！我也不尽知道……天主教尚拘守，耶稣教善变通；天主教有会有王，耶稣教有会无王；天主教不专将新、旧约示人，耶稣教专重新、旧约，这便是不同之处。（司香旧尉〔邹弢〕1896：20）

上述文人对天主教与耶稣教的评比，实有个人的偏见，但也显示当时部分文人的观点。并且，他们对新教的偏好也表现在以“新、旧约”指称圣经。

6.3 有些文人借新、旧约判今、古文

陈熙远（2016：50）指出，清末中国面临西方军队和文化的入侵，文人担忧国家即将面临亡国丧教的情形，因此部分文人提倡舍弃古文经，以今文经恢复正统的儒家教训以救国，其中主要的文人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与唐才常（1867—1900）。

康有为在 1891 年《致朱蓉生书》中认为，以古文经主导的伪孔教终无法因应外教的挑战：“彼《新约》《旧约》之来，正恐无以拒之”（315）。康有为又说，若泰西诸国以其霸权为后盾强力推行西教：

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新约》。
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1891：325）

康有为是以《新约》《旧约》指称基督教经典，甚至有时仅仅标出《新约》。

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第 60 条曾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
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1998：49）

梁启超论及耶教经典，也仅仅标出《新约》。

谭嗣同于 1896 年《仁学》中主张：“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9）其中谭嗣同完全未提《旧约》，却以《新约》为“西书”之首。

唐才常在《景教源流考》一文中明示：“景教源流，大率不出新、旧两约。”又主张，

“尝窃论之，《尚书》《周礼》《仪礼》《毛诗》《左传》《孝经》《尔雅》为古学派，即西教之《旧约》也；《论语》《孟子》《公羊》《谷梁》、大小《戴记》、齐、鲁、韩《诗》为今学派，即西教之《新约》也。古学派多君主权及三代旧制，今学派多孔子因时创改以治天下万世之法制。故不明于今、古学派之分歧者，急以分新、旧约之法读之，自迎刃而解，而厘然有当于其心矣。”（唐才常 1968：61-64）

唐才常论基督教的源流，是以“新、旧两约”指称圣经。且借由新、旧约的分别，将儒家经典拆解为今、古两学派。并且主张，要明白今、古学派的分歧，需以分新、旧约之法读之，就迎刃而解。事实上，前述部分学者为提倡今文学而舍弃古文经，借用新旧约的分别来判定和对比是一种偏见和误解。然而前述的发展却也渐渐促成以《新约》《旧约》或新、旧约或新旧约来指称基督徒圣经。

7. 结论

本文探讨了汉译圣经书名的演变，早期汉译圣经的书名相当依照英译圣经而订定，例如《古新圣经》和《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就相当对应于英文《钦定本》的书名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但是，往后受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演变出《新旧遗诏圣经》、《新旧约圣经》和《新旧约全书》等具中国特色的圣经书名。演变的趋势可归纳为（1）从以《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或《新旧遗诏全书》或《新旧约全书》为主演变为以《圣经》为主。其主因是“圣经”这词所指涉的改变：“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和《官话和合译本》的刊行似乎是个转变点，在此之前，对于文人和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圣经”二字代表的主要是儒教经典；在此之后，因许多文学散文作家以“圣经”指涉基督徒的经典，《圣经》渐渐成为基督徒经典的书名。（2）从以“遗诏”为主演变为以“约”为主。其原因，一方面，太平天国发行的圣经题名“遗诏圣书”；洪秀全尊神为天父，基督为天兄。当时若使用“遗诏”一词恐有抵牾皇权之虞而改用“约”；另一方面，英国圣经会于 1853 年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运动；到 1869 年，共印行了 75 万本《新约全书》。之后，“约”渐渐取代了“遗诏书”为圣经书名。（3）从以“旧新”为主演变以“新旧”为主。其原因之一方面，有些文人在评比天主旧教与耶稣新教时，偏好新教，主张耶稣新教专重新、旧约。另一方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借用耶教新旧约的分别，来提倡孔教今古文的对比。这些是部分儒者文人对西国经典的偏见和误解，是有争议的。但渐渐约定俗成地以《新约》《旧约》或“新旧约”指称基督徒圣经。

注释

1. 本文以英译圣经作对照组，是因《和合本》委员会组织章程说：“基础文本是以英国人修订的新旧约译本所基于的文本为准的，若有任何差异，均按钦定本作出取舍”（转引自尤思德 2002: 195）。尤思德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和合本》委员会是根据《美国标准本》的读法作为学术和研究的最后决定。”（279）
2. 《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y*）指出，“Bible”这字的起源是“Middle English via Old French from ecclesiastical Latin *biblia*, from Greek (ta) *biblia* ‘(the) books’ , from *biblion* ‘book’ , originally a diminutive of *biblos* ‘papyrus, scroll’ , of Semitic origin.” 所以，《The Holy Bible》是许多作者所著之许多卷书的合订本，因此，《圣书》或《圣经》皆是合宜的汉译。
3. 罗马数字，即 1609。
4. 例如，“古新圣经”，当时未正式刊行，乃注记于此。再例如，海恩波（2000: 233）和高玉霞（2015）皆提及《圣经新旧遗诏全书》，史称《高德译本》，由高德、罗尔悌完成，1868 年出版。但是，尤思德（2002）和蔡锦图（2018）却只字未提此译本。本文也找不到其书名页或版权页照片或资料。本文表 2 未列出此版本，但仍注记于此。
5. 许多文献显示，马殊曼和拉撒《新旧遗诏全书》（1822）由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差会出版社（The Mission Press）出版。本文无法取得其封面的资料。
6. 书名页：《圣经》，吕振中译，香港圣经公会代印；边栏：“旧新约圣经”。
7. 序言中说：“联合圣经公会……一九七九年完成新旧约圣经”。
8. 本文中许多清朝士人社群的引文得益于陈熙远（2016），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冰心 . 1921. 圣诗 . 冰心全集 . 第 1 卷 . 卓如主编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 第 163 页 .
- [2] 蔡锦图 . 2018. 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 . 香港：道风书社 .
- [3] 陈熙远 . 2016. 新旧约与今古文——“圣经”在儒教中国的近代启示 . 周春燕，张哲嘉，陈熙远主编，交界与游移：跨文史视野中的文化传译与知识生产 . 台北：麦田出版社 . 第 21-64 页 .
- [4] 高玉霞 . 2015. 汉语圣经“新旧约”话语传统的形成 . 圣经文学研究 10: 284-295.
- [5] 海恩波 . 2000. 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 蔡锦图译 . 台北：国际汉语圣经出版社 .
- [6] 韩愈 . 1966. 韩昌黎全集 . 台北：中华书局 .
- [7] 康有为 . 1998. 新学伪经考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8] 康有为 . 2007. 致朱蓉生书 . 康有为全集（第 1 集）. 1891.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9] 梁启超 . 1898. 戊戌政变记 . 清议报 1: 3.
- [10] 梁启超 . 1998. 饮冰室诗话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 [11] 任东升 . 2007.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 [12] 司香旧尉〔邹弢〕 . 1896. 海上尘天影 . 古本小说集成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13] 谭嗣同 . 1954. 谭嗣同全集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14] 唐才常 . 1968. 各教考原—景教源流考 . 觉颠冥斋内言（第4卷） . 台北：成文书局 . 第 61-64 页 .
- [15] 王韬 . 1875.瀛壤杂志 . 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光绪元年刊本 6: 11.
- [16] 吴承恩 . 1983. 西游记 . 台北：桂冠 .
- [17] 许宏度 . 2013. 新旧约圣经轻松读 . 台北：华神出版社 .
- [18] 许牧世 . 1983. 经与译经 .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
- [19] 游斌 . 2007. 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 . 圣经文学研究 1: 348-368.
- [20] 尤思德 . 2002.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 蔡锦图译 .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 .
- [21] 袁进 . 2007. 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文学评论 1: 123-128.
- [22] 曾国藩 . 2005. 讨粤匪檄 . 曾文正公全集卷三 . 李瀚章编辑 . 台北：文海出版社 . 第 1-3 页 .
- [23] 张爱玲 . 1943. 封锁 .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 台北：皇冠出版社 . 第 490 页 .
- [24] 张中良 . 2010. 五四文学：新与旧 . 台北：秀威出版社 .
- [25] 赵维本 . 1993. 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 .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
- [26] 赵晓阳 . 2010. 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 . 清史研究 3: 75-82, 137.
- [27] 周复初，谢仁寿，杭极敏 . 2019. 追求更好——论圣经翻译 . 新北市：橄榄出版社 .
- [28] 周作人 . 1921. 圣书与中国文学 .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 [29] 朱熹编撰 . 2012. 四书章句集注 . 杭州：浙江大学 .
- [30] Cooper, W. and Ross, J. 1975. World Order.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1: 63-111.
- [31] Daniell, D. 2003. *The Bible in English—Its History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32] Porter, S. E. 2016.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ts Possible Contribution to Bible Translation. *Open Theology* 2: 523-538.
- [33] Zec, D. 1994. *Sonority Constraints on Prosodic Structure*. New York: Garland.

作者简介

周复初，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台湾“中央大学”杰出教授、荣誉教授。研究方向：圣经汉译，中国基督教之本土与全球发展。



徐淑瑛，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博士，台湾中山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形式句法学、句法意义接口、汉语句法、英语文法教学、圣经汉译。



王世平，英国诺汀翰大学博士，台湾科技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和圣经文本分析。

